

• 桐江学术丛书 •

# 泉州古代著述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泉州古代著述

◆ 齐鲁书社

晉江陳聲齋刪修

歐陽行周集  
十卷

四庫全書

歐陽行周集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 泉州古代著述

齐鲁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古代著述 / 陈笃彬, 苏黎明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2

ISBN 978-7-5333-1957-1

I. 泉… II. ①陈…②苏… III. 古籍—简介—泉州市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829 号

## 泉州古代著述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http://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mailto: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957-1

定价: 35.00 元

---

## 序言

唯特定方域之突出文士是选,施設专篇评介其作,此文体源远流矣。北朝齐周之际宋孝王所著《关东风俗传》,“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邳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刘知几《史通·内篇·书志》),即其滥觞者一也。明清以降,地方史乘多有类此者,盖一地文人著述之繁夥阑珊,乃此域社会经济兴衰、文化积淀深浅之反映,良史必志焉。

笃彬、黎明二君,泉州人氏,笃好文史,明敏古鉴,近年尤致力于彰显乡学前贤,先有《泉州古代书院》、《泉州古代科举》、《泉州古代教育》行世,今复以《泉州古代著述》付梓,笔耕克勤,秋实积案,诚可贺也。其所谓著述,乃取古“经籍”之意,网罗甚广,盖如《隋书·经籍志序》所云:“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是书以人系文,通贯千载,周及四部;缕析乃历数泉州籍文士一千余名,著述三千余种,总观则概括历代泉州文士著述之特点,其立意也可佳,其论说也可采。读斯篇者,不惟可按验泉州古代文脉通滞与国运盛衰息息相关之状,抑且可就评点泉州古代文士其人其作献疑争鸣、拾遗补正,神与物游,不亦乐乎。

岁次丁亥陈明光序

## 引言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著述也是其中重要内涵之一。著述作为文化的文字表现形式，既是文化的高端凝结，也是文化的某种象征与标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发展的状况。自唐代迄清末，泉州的文人学者，文以载道，言为心声，得之心而笔于书者，千百年踵相接，著述作品洋洋大观。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历朝历代的泉州文人学者究竟有多少著述？这些著述主要内容有哪些？在当时和后世有多大影响？目前尚有多少著作存在？收藏于何处？所有这些，都是很值得梳理的问题。因为，梳理这些问题，无疑有利于加深对泉州历史文化丰富内涵的认识，有利于推动“泉州学”及“闽南文化”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推进海峡西岸文化走廊的建设。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介绍不多，更缺乏系统的阐释。

唐五代是泉州著述渐次兴起的时期。唐代以前，泉州地区尚处于初步开发阶段，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著述缺乏相应的基础，故没有什么建树。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教育的日趋发达，人才的渐次崛起，泉州的著述活动也日渐活跃。欧阳詹、欧阳栉、许稷、陈嘏、陈黯、盛均、陈峒、王毂、颜仁郁、谢修、王虬等一批文人，锐意进取，潜心钻研，创作了一

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学术文章。五代虽是一个动乱时期,泉州的著述活动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发展并仍然有所成就,涌现出康仁杰、詹琲、陈保极、黄讷裕、谭峭、黄仁颖、王肱、陈逖、郑希闵、释义存等颇有成就的人物。唐五代泉州的著述,尽管同中原地区比较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全国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泉州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为宋代泉州著述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欧阳詹,是唐代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文学家,而在福建文学发展史上,则是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故被称为闽地的“文祖”。欧阳詹的学术文章对泉州以至福建文化的发展,文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泉州著述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入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加速,泉州成为全国上州之一,社会长期相对安定,经济地位迅速上升,跻身全国发达地区行列,尤其是南宋时期,泉州一跃成为东方大港,经济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士人力求上进,社会习儒成风,教育蓬勃发展,书院林立,学校星罗,所谓“家诗书而户弦诵”,“十室之间,必有书舍,诵读之声相闻”的景象,正是当时泉州教化兴隆的形象写照。经济与教育的空前繁荣,既为著述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学术文化氛围。因此,这期间泉州参与著述的文人学者数量大增,著述范围广泛,作品数量空前,并涌现出一批在不同领域卓有成就的著述人物。他们或刻苦钻研,在科技领域中有重大创作;或善于总结,在军事科学上颇有建树;或擅长文辞,在文学领域中令人瞩目;或广搜博采,在史学上留下著名作品;或“穷究圣贤之经训,极求儒学之旨理”,为闽学的兴起立下汗马功劳。天文科学家苏颂,潜心科学而成就卓著,撰写出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名著《新仪象法要》;军事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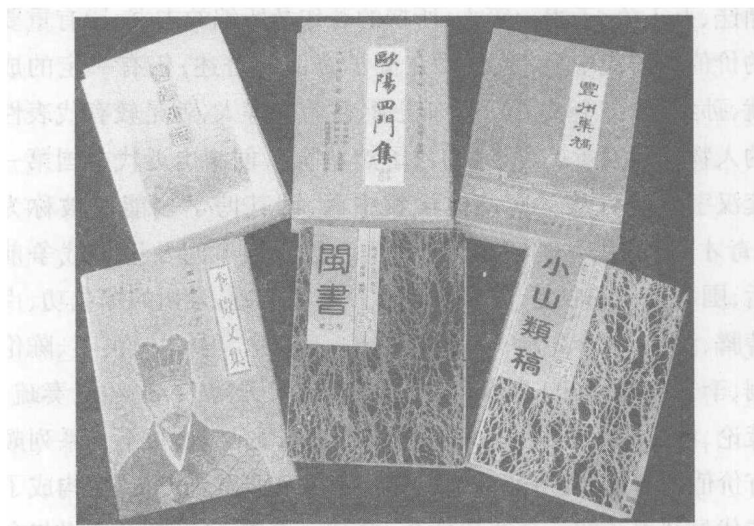
曾公亮,以文臣辅政之余,辑世界上第一部兵书集成《武经总要》;方志学家梁克家,不遗余力搜求,留下了传世不朽之作《三山志》;文学家林外,一曲《题临安邸》,成为千古名篇;史学家吕夏卿,一部《唐书直笔新例》,乃为修史者鉴;经学家吕大奎,甚丰的经学著作享有盛誉,被称为“紫阳高弟”。此外,如吕中、吕惠卿、庄绰、李诩、谢伯景、陈从易、曾会、黄宗旦、钱熙、刘昌言、张读、蔡确、陈知柔等人,也都有较突出的建树。总之,这期间泉州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庞大的知识阶层大显身手,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令世人瞩目,影响已远远超出泉州或福建,而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这些著述业绩,不仅折射出宋代泉州人文之盛,表明泉州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区之一,也极大地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所谓“海滨邹鲁”的赞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元代是泉州著述的中落时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贵族,潜意识中视汉族及汉文化为异类,不仅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且在文化方面对汉族文化进行压制与排斥,极力抑制汉族文化的弘扬。在蒙古贵族的高压政策之下,作为南人的泉州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十儒九丐”的排列,是其社会地位的实况写照,而其对汉族文化的深入研究,亦受到种种的抑制。元王朝长期弃置科举不用,选仕政策主要不以科举为途径,严重抑制了泉州教育的发展,使社会的文化水平下降,也极大地削弱了著述的文化基础。元王朝统治的九十年间,泉州先后出现两次较为剧烈的社会动荡,即宋末元初争夺泉州港的斗争,以及元代中后期延续十多年的兵乱,社会元气大伤,也使著述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说从唐代开始,经五代至宋代,前后五百年,泉州的著述活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那么这一趋势到了元代却出现了重大的逆转。虽然,这期间泉州也出现了邱葵、蒲寿

晟、释大圭、卢琦等几位有一定影响的著述人物。邱葵的成就主要在理学方面,蒲寿晟、释大圭和卢琦的成就则在文学方面,尤其是诗歌方面。但是,除此而外,成果寥寥。总的看来,从事著述的文人学者大幅度减少,著作数量急剧下降,影响力更是与宋代不可同日而语,既没有出现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也没有给泉州社会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

明代是泉州著述再度繁盛的时期。明代的泉州,科举兴盛,有力地刺激了教育的发展,使泉州的教育在全国再度属于发达地区,人才培养保持了比较旺盛的发展势头,为著述提供了较好的文化基础。相对安定的社会与繁荣的经济,则为著述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而泉州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特点,也对泉州的著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文人学者的思想显得相对活跃。因此,从事著述的文人学者,载入史书的即有五百多人,数量之众,前所未有,著作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载入史册的就有一千五百多部。这些著作,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军事、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艺术等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有几个方面成就特别突出。例如《易》学研究。从事研究的学者上百人,出版有关论著一百多部,被称为“清源学派”,把《易》学的研究推向顶峰,使泉州成为全国《易》学研究中心。再如《四书》研究。当时,泉州学者对《四书》的研究风气很盛,学术著作共有一百多部。其中,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陈紫峰的《四书浅说》,王振熙的《四书达解》,这四部名气很大的书,作为科举的指导读物被推向全国。就著述的社会影响而言,明代并不亚于宋代。明代,泉州有四十七位文人学者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七十部作品。学术上有大家出现,影响全国,这是明代泉州著述中的一个最突出表现。《明史·艺文志》所载的泉州著述人物,

共有十七位,即蔡清、陈琛、张岳、林希元、陈真晟、李贽、李光缙、杨瞿峽、郭惟贤、王慎中、李廷机、黄吾野、何乔远、徐缙芳、黄凤翔、黄居中、俞大猷。这些人,就其学术文章而言,均可称为大家。蔡清是大理学家,为明代朱子学者第一人,影响遍及全国。陈琛、张岳、林希元三人,为明代中后期最有代表性的福建朱子学者。李贽是大思想家,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对儒家封建礼教展开尖锐的批判,在当时的思想界绝无仅有。李光缙可称为经济学家,他敢于冲决“农桑为本,商为末”的传统观念,在全国亦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慎中,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之首,是开明代中叶以后文坛上反复古主义先河的人。布衣诗人黄吾野,则是明代与李攀龙、谢榛、王元美及沈加则齐名的诗人,所谓“山有武夷,人有孔昭”,反映出其诗歌的地位之高。何乔远的洋洋巨著《闽书》,乃是明代福建的一部百科全书,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不愧是一位著名的方志学家。所有这



图一 泉州古代著述六种

些,也正是继宋代之后泉州著述再次达到一个高峰的基本标志。明代的泉州,曾有所谓“人文之盛,甲于闽省”之美誉,与此不无重要关系。

清代是泉州著述平缓发展的时期。清初的禁海迁界,对泉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破坏。随着台湾的统一,沿海的“复界”,康乾之世,泉州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海内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教育发达,学风鼎盛,府州县儒学不断修葺扩建,新建书院遍布各地,各县社学林立,私塾遍及城乡,人才辈出,文化繁荣发展,涌现出大批学者和文学家。清代前期,泉州学者致力复兴理学,成就突出,著名学者有李光地、李光坡、李清馥、陈迁鹤、陈万策、官献瑶、世拱显、王命岳等,许多理学著作风行一时。文学方面,著名者有回族诗人丁炜,有文学家林嗣环,还有施世纶、出科联、洪科捷等。语言学方面,黄谦著《汇音妙悟》,首创拼音方案,影响很大。史志方面,著名的有黄虞稷、陈允锡、陈伦炯、潘鼎诰、万正色、王得一等人,所撰的著作及所编的志书,皆有一定的价值。清代中后期,泉州在儒学方面的著述,仍有一定的成就,孙经世、陈金城、孙珩、陈庆镛、戴希朱等人,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卢懋章撰写了《一目了然新阶》,创制出近代中国第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辜鸿铭学贯中西,因其博学多能而被称为“奇才”。清代,尤其是清初的顺治至康熙年间及甲午战争前后,围绕台湾的收复、开发及割让日本等问题,泉州的郑成功、卢若腾、沈佺期、李光地、李日呈、施琅、万正色、王得一、吴英、陈伦炯、李长庚、潘鼎诰、陈荣仁、施士洁、江日升等人,曾经以奏疏、策论、诗赋、专著等形式,陈述了各种各样的见解,留下一系列颇有价值的著述,是研究清政府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史料,也构成了清代泉州著述的一个突出特色,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泉州与台湾关系的非同一般。清代,封建统治日趋腐朽,在阶级矛盾与民

族矛盾的复杂斗争中,泉州的陈庆镛、黄宗汉、许邦光、陈金城、吴鲁、吴增等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文人学者,以笔为武器,愤怒声讨列强的侵略罪行,痛斥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抒发强烈的忧国爱民之情,提出各种御侮图存的主张,影响重大。鸦片战争后,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泉州著名的军火科学家丁拱辰,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撰写了著名的《演炮图说》,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个正确而完整论述西洋武器的人。总之,经历了明代的再度繁盛之后,清代泉州的著述活动仍然相当活跃,绩效也颇为可观,仍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著述作品众多,相当一些著作亦有较高的水平,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但是,由于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迁,这期间的著述也出现不少新的突出特点,尤其是前后期的侧重点有较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满清王朝的瓦解,封建制度的终结,泉州的著述活动从此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纵观泉州古代著述发展的历史,有几个特点颇为突出:一是发轫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和带动,泉州土著文化发展比较迟缓,但“世外桃源”式的安宁,有利于接纳中原士民,共同创造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二是受惠于高度发达的教育事业,自唐代以来,泉州士人十分重视教育,造就出大批文人学者,形成不少文人学者群落;三是因海外的交通和贸易历来发达,文人学者的发展呈外向的特点,出现许多高瞻远瞩、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四是受山林深阻,故文人学者发展不平衡,有的还带有家族和地方群体的特色,其所创造的文化也往往具有地方特点;五是许多文人学者在离开泉州、走向全国乃至迈出国门后,从向外的学习与交流中,增长聪明才智、发挥创造精神,从而有了卓越的建树。

泉州古代著述,上下千年,成果丰硕,载于史籍的著者,共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著作三千七百三十七部。其中,唐五代二十九人,三十二部;宋代二百人,三百九十一部;元代二十一人,四

十部;明代五百三十六人,一千五百八十五部;清代六百四十人,一千六百九十一部。这些著述,涵盖各个领域,形式多样,对古代泉州文化的繁荣,人文性格的塑造,价值观念的调节,民风民俗的改善,社会影响的扩大,均有不小的作用。这些著述,有众多得到广泛赞誉的力作,在福建以至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泉州历代著述中,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者共有三十八人,著作六十三部。其中,唐代二人二部,宋代十二人十六部,元代三人三部,明代十五人二十部,清代六人二十二部。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著者共有五十六人,著作七十四部。其中,元代一人二部,明代三十九人五十一部,清代十六人二十一部。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共有著者十四人,著作十七部。其中,唐代一人一部,宋代四人五部,元代一人一部,清代八人十部。仅此一项,即可窥见,古代泉州的著述,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泉州一笔不菲的历史文化遗产。

最后,需要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本书所指的“古代”,时间迄于清代末年,即包含整个清代。二是古代泉州的地域。古代泉州,作为一种地域概念,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变化。本书所指的古代泉州,乃是唐代至清代基本上处于泉州管辖下的地域,包括今天的泉州市各区县和厦门、同安、金门等县市。古代一直包括金门、厦门在内的同安县,虽然目前已不属泉州管辖,但从五代同安设县以来直至近代,一直属于泉州所辖,因此属于本书介绍的范畴。莆田地区虽然在唐代仍属于泉州,但宋代以后直到近代,基本上不再属于泉州的管辖,因此本书不予介绍。三是古代泉州的著述者。本书所介绍古代泉州的著述者,指的是泉州籍人士,而不包括曾在泉州生活过的非泉州籍人士。四是本书所指的著述。主要包括学术专著、编著、校注、诗文集,以及大量没有结集的诗文等。

# 目录

|            |     |
|------------|-----|
| 序言         | 1   |
| 引言         | 1   |
| 一 唐五代泉州的著述 | 1   |
| 唐代泉州的著述    | 1   |
| 五代泉州的著述    | 24  |
| 唐五代泉州著述的特点 | 31  |
| 二 宋代泉州的著述  | 40  |
| 北宋泉州的著述    | 40  |
| 南宋泉州的著述    | 68  |
| 宋代泉州著述的特点  | 100 |
| 三 元代泉州的著述  | 112 |
| 元代泉州的著述    | 112 |
| 元代泉州著述的特点  | 126 |
| 四 明代泉州的著述  | 134 |
| 明代前期泉州的著述  | 134 |
| 明代后期泉州的著述  | 162 |
| 明代泉州著述的特点  | 244 |
| 五 清代泉州的著述  | 261 |

|                       |         |
|-----------------------|---------|
| 清代前期泉州的著述 .....       | 261     |
| 清代后期泉州的著述 .....       | 318     |
| 清代泉州著述的特点 .....       | 352     |
| 六 古代著述的特点与启示 .....    | 365     |
| 泉州古代著述的主要特点 .....     | 365     |
| 泉州古代著述的几点启示 .....     | 380     |
| <br>附:泉州古代著作一览表 ..... | <br>392 |
| 参考书目 .....            | 468     |
| 后记 .....              | 471     |

## 唐五代泉州的著述

唐代到五代,是泉州著述活动逐渐兴起的阶段。唐代中期以后,以欧阳詹为代表的一批泉州文化人,在科场和仕途拼搏的过程中,创作了一批有一定水平的作品,成为有据可查的泉州最早的著述。五代时期的泉州,著述仍有一定的成就。唐五代泉州的著述活动,虽然规模与水平不仅与中原地区比较仍有较大差距,即使与后代泉州的著述活动相比也显得逊色,然而就其发展态势而言,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 唐代泉州的著述

唐代以前的泉州,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著述活动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入唐以后,泉州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对科举日渐重视,学校教育日趋发达,文化逐渐普及与提高,为著述活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因此,唐代中期以后,带有某种学术思想的著述活动逐渐活跃,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泉州文人学者从事著述活动,从现有史书的记载看,始于唐代中后期,即唐德宗建中至贞元年间(780-805),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在这之前,泉州文人是否有著述面世?从理论上说,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因为,泉州尽管开发较迟,但从秦汉时期开始,随着中原汉民陆续南迁泉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泉州开发的速度已逐渐加快,文化事业也在发展。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东汉末年,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260),东吴建东安县于泉州西门外的丰州,属建安郡,辖地约今南安、晋江、同安三县。这是由于中原汉人入居泉州,泉州地区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所以在丰州置县加强管理;二是泉州发掘出的晋朝墓葬中的大批文物,表明这期间泉州的文化不仅已受到中原文化的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且已有了相当的水平,并非完全是一片蛮荒之地;三是西晋太康三年(282)和九年(288),在今泉州城南的晋江岸边和南安丰州的九日山下,分别建了元妙观和延福寺。这两座规制宏敞的大型宗教建筑物,一座是佛教大禅林,一座是道教大宫观,均凝聚着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和精深的文化内涵,没有较为发达的文化,很难兴建这两座大型宗教建筑。四是乾隆《泉州府志·山川》云:九日山“自晋以来,缙绅先生以及方外之侣多登憩焉”,表明此地自晋代以来即有文化人往来。这些往来的文化人,当有某些著述活动。不过,因为史无明载,只能作为推论。

如果说汉、晋时期泉州已存在着著述的可能,那么,这种可能性在东晋至唐初进一步增大了。因为,从东晋经梁、隋直到初唐,又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期间,中原汉民进入泉州的更多,泉州的文化教育也进一步发展,某些著述活动的进行,应当更具现实可能性。这里同样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梁朝增设南安郡,管理闽南事务,郡治即在今南安丰州。南安郡的设立,乃是由于这里的汉族移民大量增加,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地位变得相对重要起来,故要在此设郡以加强管理。二是唐初所建的东塔及唐开元年间所建的开元寺,同样凝聚着精深的文化内涵和丰富多

彩的建筑艺术,没有相当一些高层次的文化人参与其中,这样的建筑是不可想象的。从理论上说,这些文化人当有某些著述活动。三是史籍的记载。宋祁与欧阳修所编纂的《新唐书·欧阳詹传》载:欧阳詹之前,“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虽能通文书吏事,不肯北宦”。韩愈所写的《欧阳生哀辞》亦云:唐建中(780-783)之前,泉州已“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者与上国齿,未尝肯出仕”。(韩愈《韩昌黎集·序》)民国《南安县志·风俗》亦载:南安在欧阳詹登科之前,已有“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者”。尽管史籍中没有明载这期间泉州这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究竟作了什么样的“文辞”,但有一些著述活动应是比较可以肯定的。三是从建中年间欧阳詹等人的著述活动也可推断,此前泉州已有一定的著述活动。因为建中年间从事著述的泉州人,既非仅欧阳詹一人,且已有较高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前泉州文化教育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没有相当一个积淀的阶段,就不可能在建中年间一下子有如此多的人从事著述活动,且能达到较高水平。这些都应当是合理的推论。不过,由于史书没有更为明确的记载,也缺乏更有力的佐证材料,上述见解也姑且只能作为推论。

无论上面推论是否合理,有一个事实则恐怕不可否认,即:中唐以前泉州的著述活动即使存在规模也不大,且水平也不高,未能在较大范围内传播,也没有多大社会影响,因而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现有可作佐证的史籍中,无论封建王朝编纂的断代史,还是福建省志、泉州府志,均看不到有关中唐以前泉州著述的记载。作为距唐代最近所编纂的两部正史,即五代后晋刘煦的《旧唐书》和北宋欧阳修与宋祁的《新唐书》,中唐以前的著述占有一定的篇幅,但是关于泉州这方面的记载一笔也没有;明代黄仲昭所编的《八闽通志》,何乔远所编的《闽书》,也找不到关于